

中国模式

理想形态及改革路径

潘德斌 颜鹏飞 吴德礼 等著
王长江 赵凯荣 陈国荣

中国立场 世界眼光

从**树**结构到**果**结构

探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路径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中国 模式

理想形态及改革路径

潘德斌 颜鹏飞 吴德礼 等著
王长江 赵凯荣 陈国荣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模式：理想形态及改革路径 / 潘德斌等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7

ISBN 978-7-218-07694-2

I. ①中… II. ①潘… III. ①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中国
IV. ①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93906号

ZHONGGUO MOSHI

中国模式

潘德斌等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金炳亮

责任编辑：肖风华

封面设计：友间文化

责任技编：周杰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话：（020）83798714（总编室）

传真：（020）83780199

网址：<http://www.gdpph.com>

印刷：武汉金地彩印有限公司

书号：ISBN 978-7-218-07694-2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19.25 插页：1 字数：310千字

版次：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6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83790604 83791487 邮购：（020）83781421

专家推荐

感到本书很震撼，首先是该书作者对现实问题的高度关注，在踏踏实实地做事，思考非常严肃的学术问题，给出具体的可以操作的路径，这是对现实的深层次关注和研究，应该说切中要害。作者的治学精神值得大力提倡和发扬，因为很多知识分子的心已经腐败了，缺乏超越功利的务实精神，甚至苟且蝇营；或者一味不满、指责、批评，于事无补。问题都摆在那儿，问题是怎么认识和怎么解决；回避问题的下场，除了等死，还有什么？关于这一点，恐怕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是在利益面前大多数的人宁要蝇头小利，也不肯拔一毛而有利于改革。近來我开始怀疑所谓的东方智慧，但本书却有益于重建对学术和智慧的信心。

朱文通 河北省社科院历史所所长

在秦以后的两千多年间，中国在乱与治之间不断地循环，而当下中国也深陷腐败造就的困境。如何走出这循环和困境是中国知识界最为关心的问题：以打补丁的方式进行改革，还是致力于深层结构（即权力结构）的转型？为了解答这个疑惑，本书作者提出了完整的权力结构理论，创造性地探寻谜底，推动我们眺望崭新的地平线。

王晓华 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

从近现代人类文明社会发展轨迹看，现代化始终是文明发展的“中心议题”。现代“文明价值”取向与“文明制度”构建，牵动着思想家的神经。即使在今天，现代性仍然是一项“未竟之业”，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现代价值与现代制度仍在探索之中，“中国模式”还是一篇“命题作文”，仍需当代有识之士的不懈追寻。关于“权力结构”的研究著作，无疑是目前为止代表学术界对中国社会的“现代性”研究最为深刻的一本，因为它抓住了中国进入现代性社会的最根本症结——权力结构改革。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结构性改革”，是确立人民群众在权力结构中主体地位的改革，没有人民群众的这种主体

地位，中国就很难迈入现代性门槛。仅就这个意义上讲，本著作就值得一读。

竹立家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人是复杂系统，由人所组成的社会更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权力结构是社会复杂系统的核心课题，对人类文明演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本书作者们所开展的大胆和深入的探索是难能可贵的，值得鼓励和支持。

余振苏 北京大学工学院教授、《人体复杂系统科学探索》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阐释框架通常都来自于西方，且少见深刻消化和吸收，更不用说创获。本书从西方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出发，提出四大权力结构理论阐释框架，对当下中国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现象及其文化原因的解释极富说服力，且解释框架整齐划一，此种创获性的理论努力在国内学界极为难得。该书对中国模式理想形态及实现路径的描画，立足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目标则指向中国未来，既有对具体问题的深刻剖析，也有明晰的价值判断，问题意识和方向意识兼具，对于改进和完善国家制度来说作用非常重要。

门小军 上海社科院马列所博士

本书将是一部震撼学术界的大作，作者创造性地提出了权力结构理论，对中国社会问题进行了透彻分析。它不仅是现代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可喜成果，其精神、成果和方法令人钦佩赞叹。本书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且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现实中国社会的权力结构仍旧采用传统的树结构，唯有对其进行类型转换，才有改革的成功与中华的复兴。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虽然借鉴了若干西方理论，但贯穿全书的灵魂唯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权力结构改革，既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又是“五不搞”。该书体现了作者的博识、睿智及洞见，蕴涵着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良好和他对13亿中国人深刻的人文关怀。凡是对中国关心的人，相信都能从本书中获得很大启迪。

王永华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党建部副教授、博士

当泱泱大国从世界鼎盛慢慢跌入受尽屈辱之境的时候，她为什么如此落后？

当改革开放30多年后，她从弱国变成经济大国但腐败越反越严重、分配越来越不公、诚信越发缺失的时候，这个国家为什么会在经济腾飞中却乱象丛生？如何解决这样的社会乱象问题？本书提出的权力结构理论，颇感虽是独家之言，但观点新颖、深刻，对启发思考，裨益不可忽视。我们相信：中国人一定能有足够的智慧解决自己所面临的任何问题。

何云峰 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本书提出的若干概念或可争议，但其整体性变革的思路，显然不容怀疑。近年来，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实际上是各种议论的焦点，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书生草民处江湖之远而报国心切，但其各种美意良法，似并未得到庙堂的认真回应。当投机分子、痞子学者随风起舞，既唱且打时，真正的问题不是中国没有思想，而是如何使这些思想成为社会的财富。

单世联 上海交通大学文化管理系教授

当今中国成为国际学术研究热点。围绕着中国发展的成功和问题正开展激烈讨论争论。只是中国人至今没有拿出一套系统的令人信服的符合历史逻辑的学术解读。新加坡大学郑永年教授评论说，中国没有自己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必须承认马克思的理论、西方的学术体系和中国传统文化都没有给出答案。我们需要继承这些成果、创造现代世界的中国社会科学体系。这是中国学人庄严而艰巨的使命。近年来，潘德斌教授联络一批有志于此的学人，开展学术研究创新，大胆提出崭新的“权力结构论”，发表诸多文论，尤其是最近完成的本书，对中国发展的根本难题进行深度的解剖分析探讨，是现代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可喜成果，其精神、成果和方法令人钦佩赞叹。

冀广庆 教育部退休干部，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教授

本书流露出学者们忧国忧民的情怀与思想，我十分赞赏。纵观古今中外历史，无论何种社会，都不取决于它强大与否，而是看这个社会是“敬畏民众”，还是“敬畏权贵”。当它“敬畏权贵”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不和谐，就痛苦，就焦虑，就涣散，就丧失了灵魂，尽管它GDP占世界第一也无用，如清朝后期就是这样。

我们不希望“敬畏民众”理念的贯彻只靠个人魅力(即人治)起作用。我们希望将“敬畏民众”的理念通过制度的方式建立起来,让社会永远不会因为个人错误而偏离正确航道。本书建议建立的“社会主义果结构”社会,就是这样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才能真正消除老百姓“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我们任重道远啊!

樊炳辉 山东科技大学教授

以学者的良知为民族复兴、社会和谐,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
发展规律,为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宋善文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中国现实的症结究竟何在?在于它的权力结构的类型仍旧是传统的树结构。“文革”产生的根源,是我国社会的树结构体制(即以树结构为权力结构的体制);只要树结构仍旧在,就有产生类似“文革”的危险存在;现实社会中的腐败,两极分化,市场经济的不能良好运行,法治社会(含市民社会)的未能很好的确定等,都源自于树结构体制。现实社会之所以形成“权力市场经济”,“权力与资本的结合”等,也源于树结构体制。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社会的体制改革,是指权力结构的类型转换;且只要进行了权力结构的类型转换,就能很好地解决上述一切问题。

**王志伟 教育部重大课题首席专家、中华外国经济研究会副会长、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吴敬琏先生说:“在我国改革的早期阶段,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不少市场取向改革的支持者都认为,只要放开了市场,就能保证经济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而没有认识到市场的运行是需要一系列其他制度的支撑的。没有这种支撑,市场经济就会陷入混乱与腐败之中。所谓好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公正、透明的游戏规则之上的,即法治的市场经济。”本书彻底解决了支持市场经济良好运行的“其他制度”的充要条件,就是这个社会的权力结构类型必须是果结构类型,并给出了建立“法治社会”的法则。

张盼玉 全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导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学到的最重要的思想和意识就是，知道尊重本土的传统和特点，知道用好的方法对应本土的情况。日本和韩国之所以能作为东方和亚洲的成功典范，其根本原因也在于善于将先进的理论进行本土化改造。本书的探索有着丰富的现代化发展的本土判断和构想，是中国未来改革与发展的可贵借鉴。若能在改革试验中再加以实践检验，“中国模式”对世界的贡献将会有新的超越，也会使中国人在未来的发展中更好地找到自我，树立自知、自信、自觉、自强的信念。

程方平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什刹海书院副院长

在这样一个公共理性缺失、众声喧哗的时代，我们能够品读到这样一部视角新颖、意蕴深厚的现实巨作，着实是我们的幸运，更是这个变革时代的幸运。只要我们走进结构改革这一步，我们就能看到希望，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就会有未来！

倪明胜 天津市委党校廉政理论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中国传统和现实社会的权力结构是一脉相承的，我将其称之为“有分权的集权制”（即有横向和纵向的分权，但分权的目的是为了制衡，而是为集权）。这种权力结构既牢固又奇特，既有适度的弹性又有必要的张力，是中华文明延绵不衰而又缺乏自我更新能力的制度根源。本书具体分析了中国传统社会和现实中国权力结构的基本特征，特别针对当下中国发展中的种种制度和结构困惑，反思了中国过去的发展思路和对策，其学术指向、问题意识和现实关照十分明确，为打破“有分权的集权制”和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等等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拳拳之心可见天日，值得充分肯定和大力推荐。

虞崇胜 武汉大学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人类的理想社会是“人本社会”，把人从“权力的异化”、“金钱的异化”中全面解放出来，回归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人本社会实现的全部条件是物质的极大丰富，像泉水涌流，即共产主义社会。中国背负几千年“权本社会”沉重的历史包袱，又历经“钱本社会”的种种阵痛，腐败泛滥的困扰，只有力倡民本、

人本社会，认真清算权本社会遗毒，又用厉法抑“钱本社会”弊端，才有好的愿景。本书就是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权本社会”包袱，法抑“钱本社会”弊端的始作。

伍新木 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美国宪法之父汉密尔顿曾于1787年，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命题：“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指正组织？”当今的中国也正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快速增长后，因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而引发的社会问题正在凸显出来，有关权力配置和权力制约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学界面临的“真问题”。用经济学的术语说，是正确寻找相关的约束条件和把对实例的研究上升到一般化层次的过程了。读过本书，感觉到作者正在做这样的事，作者提出了完整的权力结构理论的研究很有价值。我以为，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在这种“深思熟虑”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中逐渐形成的。

李炜光 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本书从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出发，概括了世界上存在的四大权力结构，并以此理论具体分析了中国传统的权力结构和中国模式的权力结构特征，提出了有关中国改革的独特视角。作者观点新颖独到，具有一定创新性，应该在有关中国改革的理论中占有一席之地，作为学术界研究中国改革路向和措施的一种有价值的参考。

马龙闪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大作是作者多年用心血写作的精品，特此推荐。此书出版会引起学界讨论，这是好事，学术就是在不断讨论中有所前进。

汤一介 北京大学儒学院院长、教授

现代化是一个政治、经济与社会整体变迁的过程，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这并不能掩盖其在政治、社会等方面的矛盾与危机。现代化各要素的不平衡发展容易导致现代化的挫折，而当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势在必行。

如何推行切实有效的政治体制改革？本书在系统提出权力结构论的基础上，提出改革的关键在于实现权力结构的类型转换，即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从传统的树结构转向树-果结构，最终转换为果结构。本书现实意义强烈，问题意识深刻，理论阐释新颖，堪称为我国政治现代化献策的一部力作。

刘金源 南京大学教授，现代化问题研究专家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历史是一部贪污腐败史；是一部知识分子为了集权政治而牺牲独立人格和自由的历史。以树结构体制来剖析历史中国，尤其清晰、深刻。

胡星斗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本书从权力结构的视角对中国政治问题进行了很有价值的探索。不过，我不接受显然倾向于自满自足、评功摆好的“中国模式”这个提法，它严重妨碍我们正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失败方面和需要痛下决心改革的种种体制弊端。

童之伟 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研究权力结构是抓住了当今社会的要害。权力再大也莫过于总统吧！请看德国总统，他之所以下台，原因之一是：买住房时贷款利率偏低。哎哟喂！总统怎么还需要自己买住房呢？机关局没尽责任，应予处分。还有，买就买吧！怎么总统还要贷款？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权力结构值得研究。

邓伟志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怎样认识中国社会？按过去几十年的标准说法：从秦汉至清末是封建专制主义，而1949年之后是社会主义。本书发现：我国现实社会采用的权力结构与中国封建社会同类——都是树结构类，这决定了他们的社会运行、控制（含轨道与方式）、秩序及稳定性（能级）等等都基本相同。并证明了：我国现实社会主要问题（如腐败、市场经济不能良好运行、诚信缺失等等）产生的根源是树结构的存在。中国复兴的根本之处在于权力结构的类型转换：从树结构类转换成果结构类。不论其结论是否能够获得知识界普遍认同，其不人云亦云的探索精神就很值得令人尊敬。

马勇 中国现代化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模式，是欧美200年，日本70年完成的工业化，我们只用了30年。因此，需要总结，值得总结。更重要的是，需要前瞻，需要把握前行的方向，使我们的国家在未来的10年中完成工业化，在本世纪中叶时，成为一个中等发达的现代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周天勇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今天的中国的确面临着许多问题，在许多人还满足于“人民的问题用人民币解决”的思维时，理性的学者不仅洞察到了问题背后，而且潜心探究问题产生的根源、诠释问题发生的过程，深受启发。从中国的问题出发寻找解决中国问题方案的研究，既是方法的创新，更是思维的转型。以法律人的视角，理性的制度安排是“根”，合理的政权结构是“树”，良好的法治状态是“果”。期待有更多的学者参与这样一个宏大命题的研究，以“东方智慧”构建真正的“中国模式”。

吕忠梅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序一

楚 渔^①

一、“光荣革命”与“辛亥革命”差异

自1689年英国“君主立宪制”诞生后，就有不少人批评它的不足之处：它保留了君主的王冠以及部分“皇权”，留下了“封建社会的痕迹”；“君主立宪制”不如“民主共和制”革命那么彻底，是新旧势力妥协的结果。说来也奇怪了：在英国这个保留了部分“皇权”的社会中，“皇室”的存在并没有妨碍此后其政治变革与民主化进程，也没有阻碍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封建社会的痕迹”在英国似乎也难以见到了。

在东方的中国，“辛亥革命”已过一百周年了。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了彻底推翻封建王朝的“革命”。特别是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人民欢天喜地地迎来了几千年以来的彻底解放，随后又建立起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皇室”没有了，但“旧社会的痕迹”并没有完全肃清。邓小平同志在建国30年后就讲道：我国的“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搞特权，就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②又一个30年过去了，上海大学历史学教授朱子彦指出：“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皇帝和皇帝制度，但帝王思想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很难从人们头脑中消除。”^③

我们知道：任何国家制度，都必定建立在一定的权力结构之上。而人

①楚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会研究员。

②《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2-302页。

③朱子彦：《多维视野的大明帝国》，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374页。

类社会自古以来，有着无穷多种的权力结构。作者把这无穷多种权力结构科学地分成了四大类型：即所谓的树结构类、果结构类、树-果结构类及果-树结构类。每一类型权力结构的建立，便决定了人们在相应国家中的深层次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运行与控制（含轨道与方式），国家的秩序及稳定性能级，决定了人们的生产力容量、法治状态，民主的方式及程度以及人们的主体社会意识、甚至连谋私的手段等等包含其中了。不同类型的权力结构的建立，便决定了这些国家制度完全不同类型的运行与控制、有序性及稳定性，等等。这就是说，不同类型的权力结构从深层次上决定了人们的运行与控制、有序性及稳定性。

如果说：中国封建社会（有人称为宗法专制社会，为统一起见，我们还是称为“封建社会”）的“改朝换代”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话，那么，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则是“天变了，但道却没变”（指社会的属性内容变了，但人们的运行、控制等“轨道”却没有变）。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祖龙虽死魂犹在”，“历代皆行秦政制”。反观英国自“君主立宪制”确定以来，则不难发现：虽然保留了“皇室”，但并没有保留“封建社会”的权力结构，而是建立起了适合资本主义社会运行与发展的果结构体制。“皇室”虽在，但新的运行与控制等是新型的果结构在起作用，所以从这类结构“显示”出来的“社会现象”，已经基本消除了旧结构所“显示”的“封建社会的痕迹”。而中国革命的胜利，虽然消灭了“皇室”，但由于国家制度仍旧建立在传统的树结构基础之上，这就决定了它的运行与控制等等与中国封建社会相同或相似（作者称他们为两类社会的“同构”现象），如都有“势位、势能”，从而使“官”与“民”之间的关系绝对化，使社会管理变成“官”对“民”的治理，而宪法和法律的运行（即实施）都得靠“势能”（即通俗说法的“权力”）去推动，这就形成了我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社会现象。从而，致使法治社会难以建立。又如，由“同权分割法”决定了相对下级的“附属地位”而没有所谓“私密权力空间”的存在，这就迫使“下级”对“上级”不敢“言真”，从而形成了“同而不和”的种种尴尬局面。何况，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之一是它的结构类型的演变。在这里，结构类型的出现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是不能跨越的发展阶段（即果结构类型在中国一定会出现的，不过只是早晚而已），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是可以跨越的（即以树结构为权力结构的社会主义社会可以通过结构改革而最终进入到以果结构为权力结构的社会主义社会，从而绕过以果结构为权力

结构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

本书证明了：“君主立宪制”与“民主共和制”及“民主社会主义制”、“民主联邦制”等等，实质上都是一样的“西方民主制度”，其差异是有的在同类权力结构上，仅仅多了个“皇室”的这个元素而已，而有的却没有“皇室”这个元素。人们也可以看出：以前的观点认为“君主立宪制”保留了部分封建王朝的痕迹的说法是不确切的，应该说，它只是保留了不碍大局的“皇室”存在的历史画面。甚至相反，“皇室”的存在，对国家的稳定、民族的团结等，还起到了很好的维护作用。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是英国人在传统与变革之间找到的一个平衡点，充分体现了英吉利民族“伟大的政治智慧”。

1939年，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指出，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①。哀！让我们再一次哀叹，深感首创“君主立宪制”的英吉利民族的“伟大的政治智慧”。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张鸣指出：“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快要一百年了。”“民主共和思想，是否深入人心不知道，至少在名号上，跟上了世界潮流。就凭这一点，也值得庆祝一番。”^②

二、是整体结构的改革，还是对树结构的修修补补？

任何一个国家(或称社会)系统，都存在一个体现其国家(或社会)的主要功能或机制的整体结构，由本书文1知道：这个整体结构就是用“权力”把有权力关系的两元素黏结起来的，故把这个系统的整体结构又称为权力结构。又由于“权力相关的两元素”间只有“附属关系”及“相对独立关系”两类，它们分别由“同权分割法则”及“异权分割法则”构成，从而便构成了人类社会的树结构及果结构，以及树-果结构与果-树结构等四大类型的权力结构。例如，发达国家的权力结构基本上都是果结构，而原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基本上都是树结构，中国封建社会的权力结构也是树结构等等。

1. 中国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只是到了明末清初中国才逐渐落后于欧美。

①转引自何广：《历史上对“辛亥革命”的纪念和解读》，《北京日报》2011年2月21日。

②张鸣：《辛亥：摇晃的中国》·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

是何原因导致中国近代社会落后呢？其实，根本原因就是：欧美于明末清初年代，早已建立起整体性能更好的果结构体制来，这就把整体上还建立在树结构体制上的中国比下去了。从这时候起，我们就开始从整体上、特别是从整体结构上输给了欧美，只是我们没有觉察。直到现在，几百年过去了，能觉察到这一点的人，还是不多。

2 国家属性内容的规定，通常是用文字表述的。而把这种文字表述的内容要在人们的生活实践中“显示”出来，主要靠的是相应社会的权力结构类型（它的功能与机制）。但从整体结构上讲，果结构在法治、民主、人权等等方面都优越于树结构，这就使人们在实际体验中，觉得属性（规定）内容好的社会主义反而不如属性（规定）内容差的资本主义。例如，著名左派哲学家侯惠勤就认为“我们今天在民主的某些形式上还未能高于西方民主”。^①本书证明了：树结构与社会主义属性（文字规定）内容根本不相容，而果结构才与社会主义属性内容相容。

3 为什么原社会主义各国，在建国才短短的十几年（其中苏联从“大清洗”算起，也不过二十多年），纷纷（或说不约而同的）掀起了改革的浪潮。理论界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哪一点不完善？不知道。我们现已证明：是社会主义整体结构的问题，不是依靠对树结构的（如我国前30多年的改革那样）修修补补，而是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的体制改革，就是对其权力结构的类型转换。

4 中国的问题，不是要不要“私有化”的问题，也不是要不要“多党制”的问题。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是权力结构为树结构的问题。例如，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都是“私有化”的典范。如明王朝时期，除“私有制”以外，甚至还有：“走出中世纪的拐点就出现在明王朝……（但也）没有用自己的双脚走出中世纪，而是被西方殖民者用大炮轰出中世纪。”^②原因就是树结构的存在，明王朝“私有制”与今天的中国民营企业情况相同，是树结构之下的“私有制”，“企业”也即所谓的“中国式的民营企业”。在这样的“私有制”之下，也只能呈现出一片“勾结官府是中国历来生意人的一条秘诀”等传统的社会现象。而仍旧不能形成一个树结构体制以外的“资本主义制度”来。同样，中国也不是要不要

^①侯惠勤：《以真理打破幻想—我们为什么必须批判“普世价值观”》，《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年3月31日。

^②吴仁安：《未能走出中世纪的明王朝》，《社会科学报》2010年5月27日。

“多党制”的问题。

“私有化”及“多党制”是发达国家体制的两大支柱。人们正是看到了这点之后才认定它们的。但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不同于资本主义，本书介绍的“大众股份制”将取代“私有制”，而果结构体制又将替代“多党制”：“多党制”的确立是为了构建果结构体制，在己是果结构体制下，“多党制”已显得多余。其实，只要经过权力结构的类型转换、最终建立起果结构体制，就能救中国了。看了此书，希望人们尽快从“私有制”及“多党制”这两者中解脱出来。应该万分急迫地认识到：解决“封建残余”、进行树结构的类型转换，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5 为什么在保留“皇室”的英国基本上没有封建社会的“残余”或“余毒”，而进行了“彻底革命的中国”却有封建社会的“残余”或“余毒”泛滥呢？本书对这个问题及其他一些问题做出了最为彻底地解答。本书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残余思想及现象”存在的根源、中国现实社会中诸如腐败、两极分化、市场经济不能良好运行，法治社会，公民社会未能建立的根源：它们都源自于我国现实社会的权力结为树结构。而这些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法，即要在大面积上解决上述问题（包括根除“文革”的再度产生、大面积地消除腐败、两极分化、促进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法治社会与公民社会的的确立、铲除“官本位”、“东方式嫉妒”等社会意识等等），唯有对树结构进行结构的类型转换（即结构改革），如从树结构转换成树-果结构，最终转换成果结构，从而在大面积上消除中华民族两千多年以来在“树结构”统治之下形成的民族“劣根性”，等等。作者认为中国社会的“病灶”就是：最先进的社会主义的属性内容却建立在最传统的树结构体制之上。

结构改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分阶段逐步实现目标的一种可以“推倒重来”的“渐近式”的改革。结构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体制改革的本质改革，是最终战胜并取代资本主义的改革。结构改革，是中国推行树结构体制二千多年以来最为伟大的社会变革。它将深刻地改变中国的民族性，也是中国与西方接轨的根本举措。

三、中国的症结何在？如何改革？

我们知道：社会制度的限定内容（如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等），只是一种纸面上的文字规定，而相应社会的权力结构才能真正“显示”相应国家实际的运

行、控制、稳定性及有序性等社会功能与机制，以及民主与法治的程度与状态等。如，同样是社会主义的属性内容，建立在树结构或果结构之下的两种社会主义，就有着质的不同。

中国的症结究竟何在？在于它的权力结构仍旧采用传统的树结构（即人们通常所说的金字塔结构）。这正如毛泽东所说：“历代皆行秦政制”。在这种社会中，“树根”（即金字塔尖）以外，再大的“官”，可以在“一夜之间”权被剥夺、遭遇关押、甚至被“逼死”。有点像“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如“文革”中刘少奇的情况就恰好如此。只要树结构存在，就有引发类似“文革”的危险；在这种体制下，由于“企业家”没有对“官员”的直接选举权——就差这一点权力，就缺乏了对“官员”的直接约束力——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刚性”约束。为了生存与发展，“于是不少商人就设法在官府中找靠山，或钱权交易，或成为红顶商人”^①。就这样，形成了现实社会中的腐败，两极分化，市场经济的不能良好运行等。树结构的确立又成了最根本的社会存在，于是，“官本位”、“巴结领导”等就成了普遍的社会意识。中国民族性的“劣根性”，也是在树结构二千多年的统治下“熏”成的。要改变这些，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唯有进行权力结构的类型转换，才会成功。而本书就是研究这一切的系统创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大发展、社会主义大厦的构建理论。

我们发现：不管“社会属性”的规定内容如何，树结构体制都不如果结构体制下“显示”出来的社会在运行、控制、秩序、稳定性以及民主与法治等功能“优越”。当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在果结构类型（可以不要“三权分立”这一种）上时，社会主义就会“显示”出比资本主义更加优越的种种特性。如运行、控制更合理，社会更公平公正，市场经济的更加良好运行，法治社会的形成，社会诚信及道德水准的提升等。

其实，说到结构改革，在世界史上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如德国当年的“容克地主”经过结构改革，不是顺利地变成了“资本家”，并在资本主义的果结构体制下很好的运行吗？著名政治学家、科学社会主义专家高放教授慎重指出：“加快改革，促进社会主义果结构的形成”。^②

2012年3月16日

①资中筠：《“官府”是中国经济的克星》，《文摘周报》2010年7月13日。

②高放：《权力结构合理化献议》，《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10期。